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新农民研究（1949—1956）

张建梅

[摘 要]乡村建设是中华民族长期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其中培育新农民是重要着力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接力“人的建设”，通过文化教育、思想改造、基层党组织发展、典型示范、政治运动等方式对农民展开多维度的立体改造，着力于培育有文化、重集体、讲政治的新农民。改造农民便是改造国家，农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厘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培育新农民的治理技术及运行逻辑，对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及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农民；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1)11-0056-08

百年乡村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将“培育新人”提上工作日程，“新人”之具体内涵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延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理想目标”，[1]同时在百废待兴之际也迫切需要各类新人投身建设。一方面，作为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农业国，推进工业化必须依靠农村及农民，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培育新农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客观来说，受封建主义残余及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农民群体的局限如文化水平较低、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等逐渐凸显，这些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定培育新农民的重要考量。

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培育新农民的问题早有关注，该问题常谈常新且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整体看来，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塑新农民的思想，作为培育新农民的重要规划者，毛泽东的“新人”理论得到较多关注。二是重点研究培育新农民的实践路径。近年来，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培育新农民这一主题，学界涌现出部分专题研究，有学者从

作者：张建梅，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人生活史角度出发，探讨国家在基层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路径及具体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还有学者从乡村治理的现代国家整合视角出发，探究党和国家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制度、技术等维度培育新农民的过程。此外，就某一具体培育路径而言，有研究者从乡村教育、组织下乡、政治运动、道德塑造等角度展开探讨，①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及方法论指导，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加深对乡村治理及形塑新农民的理解。尽管学界对相关问题展开的探讨较多，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致力于培育新农民？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乡村践行“人的塑造”？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形塑新农民的内核？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新农民缘起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西方国家的敌视，内则须面对被战争破坏殆尽、亟待恢复的经济等各项事业。处于革故鼎新关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将巩固新生政权、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等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培育新人的重要性、紧迫性一再凸显。

（一）为工业化建设奠定基础

为彻底改变旧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将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农业国家中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农民及农村作出的基础性贡献，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新农民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克服工业资金不足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工业化的赶超型战略，此时国家对于农村及农民的定位在于配合国家工业化需求，助力新中国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转变。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如何有效利用农村资源成为重要挑战。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在整合农村资源过程中出现力有不逮的现象，难以顺利接收足够物资。这与新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新的“悖论”有关，“一方面，中国革命依靠农民而成功，农民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从而作为一个阶级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建设又以农民贡献，甚至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2](p.55)在此过程中农民难免会心生不满，这便加大了党和政府提取农村资源的难度。

不可否认，封建制度束缚下的农民确实存在短视、狭隘等问题，由于长期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制及政治体系之外，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政治意识及政治参与能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同有待加强。欲充分激发农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助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宏观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认为当务之急是将农民培育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

（二）分散落后的农村需要整合

培育新农民历来是改造农村的关键环节，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便将培养“新人”视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出路，他们尝试开出不同处方解决问题，但在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下均以失败告终。

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为注重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一方面，农村资源的有效提取是国家工业化建设顺利起步的重要保障，农村、农业不稳则会使工业化及现代化建设之路受阻。另一方面，新中国初期的农村仍存在诸多问题，对乡村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新’中国只是就政权的更迭

①参见赓夫：《论毛泽东的“新人观”》，《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1期；张放：《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2期；张瑜：《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Cheng Yinghong：Creating the “New man”：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等。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而言的,新兴的政权面临的仍然是传统的农村社会”。[2](p.398)对于长期身处贫困的农民而言,填饱肚子仍是重中之重,土地改革后蔓延开来的雇工、经商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与党倡导的反对两极分化、避免剥削等目标产生分歧。分歧的不断拉大致使乡村问题激增,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治理成本急剧上升,也阻碍了各项政策、制度顺利施行。

为加强乡村整合,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同时,着力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开展多元立体的改造,强化农民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认同,致力于将“狭隘观念者”的小农改造为具有国家意识的现代农民,进而培育成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历史上看,这无疑有利于将分散的农村社会改造为具有向心力的社会共同体,祛除乡村整合中的痼疾。

(三)传统小农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进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维度着力外,“人的建设”亦不容忽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主体,农民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定的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民便是改造目标。

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糟粕仍顽固存在于乡村,如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包办买卖婚姻、封建迷信等,对新社会风尚的形成及新文化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为此,党和政府竭力肃清农村中的各类陈规陋俗,规定新农民应主动杜绝此类思想倾向及行为,助力乡村社会中新风尚、新习俗的树立。

培育新农民的本质便是对传统小农进行改造,培养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由传统愚昧走向现代文明。长期处于封建制度束缚下的农民对新生政权的了解、认同亟待加强。伴随国家权力不断下沉,农民被纳入国家体系,他们的生产生活、思维话语、价值观等均呈现国家化趋势,他们身上处处可见国家的影子,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农民的国家化,“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改造农民社会的世纪。正是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农民被国家化”。[2](p.56)党和政府希望形塑的是始终维护集体利益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而现实中的部分农民“却每天都做着发家致富的梦,不由自主地追求着家的利益和个人的荣耀”。[3]数亿农民一心求富及农民在其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会进行消极反抗甚至出现“生产力暴动”,[4](p.47)这明显不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乡村的稳定发展。

基于对国家发展大势的考量,党和国家强调亟须重集体、讲政治、顾大局的农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对于刚从旧社会深渊中“上岸”的广大民众而言,他们的知识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境界等明显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不符,这便提出了如何培育新农民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致力于通过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组织下乡、典型示范、政治运动等方式推进农民的现代化,夯实农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阶级觉悟、政治参与能力、生产积极性等,壮大社会主义建设队伍。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新农民的主要路径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培育是基于文化、思想、组织、政治意识等多重维度的立体改造,这一过程推动了党对乡村社会的民众动员、资源整合及社会治理,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一)识字教育

识字教育是塑造新农民的前提和基础。为改变农民长期被排除在教育体制之外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将农民教育纳入议事日程,并将其视为艰巨而必要的政治任务。1949年12月,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1950年,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上发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号召,提出:“识字教育是工农教育的起点,要培养工人农民读写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算的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使他们逐渐学成有文化、有教养的人。”①

为减少文盲，党和政府多措并举，通过多样组织形式推进识字运动，如创办冬学、识字班、学习小组、工农速成中学、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农民业余学校等，涵盖范围较广。在扫盲过程中注重因人、因时制宜，利用农事空闲组织农民学习，强调“以民教民”，广泛动员、组织识字的人利用业余时间教不识字的人。此外，在识字教育过程中坚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教学内容提倡由近及远，首先掌握记工等工作需要用到的词语，如本乡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农活名等，然后将教学内容不断扩展至本县、本省及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词语。此举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识字需要，极大调动农民识字的积极性。

在识字教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扫除文盲的具体标准，主要涉及识字、阅读、写作能力。1953年11月，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规定农民应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最常用的便条、收据等。1956年将认字标准提高至1500字，除读报、记账、写便条外，还要求会做简单的珠算。[5]

扫盲运动与民众文化翻身的需求相契合，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不少目不识丁的农民脱盲，能够从事基本的读报、记账等工作，部分乡村出现“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的盛况。此外，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将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及卫生教育等融入识字教育，开展声势浩大的陋俗文化改造运动，以此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及思想启蒙，强化农民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二）思想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及恢复、发展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使命。伴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推进，农民群体多元复杂的思想动态引起了党和国家的注意。为充分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决定对传统小农进行思想改造。

20世纪50年代初，农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后，利益关注点也发生变化，开始专注于土地增值及发家致富。农民一心求富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大量出现，新一轮的两极分化在农村露出苗头，这引起了领导人的警觉，认为“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6](p.184)在农村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农民“白天为土改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为拥有了土地而欢欣鼓舞，晚上又做起了传统的发财致富的美梦”。[7](p.95)河南省信阳专区遂平县第四区互助组长郭士海说：“在旧社会，我讨过三年饭，当了一辈子佃户，受的不是人的苦。如今共产党来了，分了地，翻了身，才有了吃穿，就想剥削人家。”[8]再如有农民入社后发现收入不如从前，便开始质疑集体化及社会主义，闹社、退社风潮迭起，单干、投机倒把、经营副业等情况层出不穷。

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影响，农民的保守性、涣散性、封闭性较为顽固，不问政治埋头生产的情况十分常见，当时影响较大的就是“李四喜思想”。1951年7月，《新湖南报》曾组织针对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李四喜思想”展开长达5个月的大讨论，旨在切实解决农民自私狭隘的问题，培养具备大局观念及政治意识的新农民。“李四喜思想”的广泛存在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对农民尤其是乡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松懈。

为将农民改造成合格的新社会建设者，尽快消弭各类思想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破”“立”结合，一方面竭力革除封建思想、资本主义因素等对农民的束缚。毛泽东指出，必须尽快消除农民脑中的各类旧思想，“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

①参见《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1950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1979年10月，第6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9](p.450)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政治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如加强基本政治常识教育、阶级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各类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教育等。

各地在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时一般与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主张充分考虑当地的中心工作及群众的思想状况。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文化教育全过程，冬学等成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权衡好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避免厚此薄彼。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中国共产党着手在农村构建宣传网，主要通过宣传员、报告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讲解各类政策、国家形势等，破解民众的思想困惑。文化俱乐部、黑板报、土广播、图书等也成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如通过读报、唱歌、画漫画、数快板、说相声等艺术形式将对农民的教育推进到田间地头、屋里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开展的情形下，不少农民的政治觉悟有了较大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三）建立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

不同于国民党忽视党组织在农村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注重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基层政权，这既是出于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考虑，同时也能够促进对乡村的政治整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优化党员结构，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决定限制乃至暂停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重点开展整党工作，大批不符合标准或腐化变质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农业合作化进程开启后，为充分整合农村资源，减少党同农民之间的罅隙，中国共产党决定发挥农村党组织动员、教育、领导群众的作用，限制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政策开始松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以全面推进。1954年11月到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要求1955—1957年在农村发展党员200万名到300万名，使农村党员总数达到600万名到700万名。[10](p.11)在大力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形势下，截至1956年底，党的基层组织基本实现了乡、村两级全覆盖。

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及广泛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将分散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农民的政治意识不断强化，对培育新型农民尤其是其政治参与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基层党组织须处理农村中各类繁杂的事务，其中动员、教育、组织农民等成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党员高标准激励有入党意向的农民为不断达成党的要求而努力。顺利加入组织后，农民党员还要接受党组织的纪律约束及制度形塑，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培育新农民的重要载体。正如有学者指出，“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党的目标之下，由此从根本上改造着农村社会”。[11]此外，青年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亦有效推进了乡村治理及塑造新农民的进程。

（四）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12](p.1488)选拔、培养典型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生产、动员群众及形塑新人的成功经验。作为各领域的佼佼者，典型模范符合党的要求，通常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带头、桥梁、骨干作用。[13](p.1014)作为在各领域选拔的楷模及样板，典型模范在生产、道德、政治等维度被寄予厚望，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及义务。有学者将典型模范归纳为尊者、亲者、贤者三个角色，尊者是在政治领域中应扮演的角色，“在政治上忠诚，积极履行上级派的任务，遵守政治纪律”；“亲者”是在社会领域中应扮演的角色，“能够‘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贤者”是在道德领域和专业领域中应扮演的角色，“在道德操守上没有瑕疵，在业务（‘本职工作’）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做出了突出贡献”。[1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各类模范的选拔、宣传，塑造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心追寻党的领导的新人。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模范开始出现，成为党宣传其价值观及思想的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要载体。

客观言之，对农民影响较大的模范是身边的先进典型。在农村中最常见、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便是劳动模范，评选劳动模范逐渐发展为一项制度并延续至今。劳动模范多来自基层社会，能够更直观、潜移默化地对身边的群众产生示范影响。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劳动模范运动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求得经济上的增长，二是在政治上培育坚持集体主义的新人。1950年代初，各地一般依据生产成绩、技术革新等评选劳动模范，此后出身、政治表现、个人品质等也成为影响评选的关键维度。

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对群众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及各级政府对劳动模范给予极高礼遇及充分尊重。1950年第一届全国劳模大会会前，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北京市市长聂荣臻，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等亲至北京车站欢迎与会代表，开幕典礼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毛泽东赞扬劳动模范等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15](p.217)此外，党和政府还通过建立劳动模范疗养制度，通过选派“明星”劳动模范出国访问，分配住房等方式提高劳动模范待遇。

为尽量扩大劳动模范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注重系统搜集劳动模范事迹材料并及时总结相关经验，组织劳动模范事迹展览会，媒体广泛宣传劳动模范事迹等。当选劳动模范后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地位、社会声望等对讲求实效的农民群体而言具有很大吸引力，能够鞭策他们不断努力跻身新农民队伍。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注意树立反面典型，使民众引以为戒。对于普通农民而言，惩罚机制的示范作用亦不容忽视，甚至成为一种重要的形塑方式，“在低限上规训和再造新人”，“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尽管并不奢望上升，但他们至少不愿意堕落到更糟糕的生活中去”。1955年，山东省A县在整肃乡村“资本主义”过程中，为增强震慑力及教育效果，便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牛某庚作为典型通报全县。①

（五）开展政治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改造社会及塑造新人的重任。此时，新政权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经验。各类资源的相对匮乏也使中国共产党选择继续将政治运动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此类运动的突出特点是“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16]具有常规行政手段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1949—1956年，为强化农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增产节约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此类政治运动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的重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的文化水平、生产技能、政治意识等，对加速社会整合、制度更新、人的解放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新农民成效分析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开展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维度的立体改造，成效显著，推动了乡村文化的重塑，最大限度凝聚了群众力量，同时巩固了农民对于党和国家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纵观此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新农民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破旧立新：乡村文化重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

①参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关于在合作化运动中表扬B区a乡a村支部书记石某同志和处理该乡乡支书牛某庚的情况报告》（1956年2月5日），山东省A县档案馆，档号：0002-01-0004-001。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破旧立新”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任务，受传统力量影响较深刻的乡村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重塑的重要场域。面对长期受封建糟粕文化影响的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重塑乡村文化须从“破旧”“立新”两个层面着手。一方面，持续对统治乡村的旧文化进行摧毁改造，涤清乡村社会中的各类封建残余及文化糟粕，如封建迷信活动、包办买卖婚姻、卖淫嫖娼等。此类文化糟粕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效果，对新社会风尚的形成及新文化建设均造成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乡村文化，形成与国家发展大势及农村自身发展需要相契合的文化价值体系，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及政治觉悟作为关键步骤，借助多样化载体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及精神世界，如依靠广泛建立的农村广播收音网对农民进行政策路线宣传及文化教育。

“人”的因素在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占据决定性地位，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培育新农民的历史实践是重构乡村文化的基本步骤及必要保障，农民的知识水平、政治意识、价值观等与新乡村文化的形成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推进直接促进了新农民的培育。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价值观、信仰、习俗与风尚等展开多维度的立体改造后，农民的知识水平及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能够自觉摒弃各类陈规陋俗，有力消除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渐成为新中国的主导文化，乡村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二）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近代以来，凝聚力不足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困境，集中全党全民力量以恢复、发展各项事业成为工作重点，其中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要紧密团结的对象。

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发动农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易事。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土地改革带领人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农民在生产积极性上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部分农民并非朝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朝富农的方向发展。他们并非天然的革命者，不问生产、一心求富的心理普遍存在，直接影响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以山东省A县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县三区10个乡的261名党员中有67人存在剥削行为，占全体党员的25.7%，其中雇工的有42人，放债的有2人，出租土地的1人，押地买地的23人。①农村党员的此类心理引起了党中央高度重视，认为必须进一步剔除“资本主义”等对农民的影响，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实践。

为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树人”的实践中将集体主义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核心特征，并将其视作国家发动民众的重要精神利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17](p.134)此时，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有效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进程奠定了根基。

（三）占领思想阵地：增进农民的社会主义认同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也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重要使命之一。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不少农民对共产党不够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知之甚少，这与农民文化素养较低，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有关。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并没有直接下沉于乡村社会，大部分

①参见《A县第二批整党工作总结报告》（1955年），山东省A县档案馆藏，档号：0001-01-0227-009。需说明的是，原材料汇总中有剥削行为的党员人数为67人，但其后分列的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押地买地者共计68人。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农民在政治生活中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对政治态度较为淡漠，普遍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及能力。[2](p.8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们党着手将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把农民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具备政治意识、政治参与能力并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农民成为重要旨归。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8](p.1477)在集体所有制取代农民的个体私有制过程中，我们党发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做出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非常严峻的判断，“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19](p.405)对于长期深陷“水深齐颈”之困境的农民而言，他们关注较多的仍是生存问题，对“两条道路之争”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农民一心生产不问政治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一心求富的思想及行为被划归“资本主义”倾向，单干、雇工、质疑农业合作化及相关政策、闹退社等也被划入此列。党在农村培育了以国家发展大局为重、坚定认同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有效应对了各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泛滥对国家发展大局及新生政权带来的严峻挑战。

此外，培育乡村新人过程中的文化教育、思想改造、基层党组织发展等举措为农民提供了了解国家形势、时事政策、“两条道路之争”等具体问题的契机，增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进一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奠定了群众基础，从根本上有利于增进农民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的问题从本源上讲都是“人”的问题，破解各类问题之道便是持续进行“人的建设”。以培育新人为主要旨归的国民性改造，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最关键、最深沉、最艰难的工作，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20]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重视对新人的培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 们党在农村广泛开展“树人”实践，建构了新农民的人格素质特征及培育路径，竭力剔除农民狭隘的小农意识，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推进乡村文化重塑、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及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等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培育新农民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阮清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试验场——评刘彦文《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J].二十一世纪，2021，(1).
[2]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3]张乐天.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J].社会学研究，2001，(6).
[4]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6年3月29日)[J].江西政报，1956，(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王秉林，郭明祥，安廷堂.河南信阳专区农村干部认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危害性　决心走互助合作道路并把余粮卖给国家[N].人民日报，1953-12-26.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五)[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1]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J].学海，2003，(3).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6]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0]周建超，姚静芬.论建国后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1).

责任编辑：澄　宇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ttitude, resulting in defeat and loss of sovereignty; the CPC persisted in ac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sistance and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war. (Wang Yan and Cheng En-fu)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by the CPC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1949-1956): Rural construction is a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issu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hose focus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 took up "human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and carried out a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through cultur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ypical model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etc.,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new farmers who are well-educated, collectivism-oriented and politically conscious. Cultivating farmers, namely reforming the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Clarifying the governance techniqu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PC in cultivating new farme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of great referential import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Zhang Jian-mei)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in New China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949—1960): New China's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were a large-scale cultural liber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campaign for the broad masses of peasa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y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During the rural land reform period, th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 mainly focused on "winter learning", especially the "quick literacy"; in 1953, th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 gradually changed to a perennial amateur school, and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farmers' learning and production Organize and gradually move towards stability; the large-scale spre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iteracy, and "phonetic literac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magic weapon of the peasant literacy movement. On the whole, the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development and then adjustment;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everance over the years has reduced the illiteracy rate in New China from 80% in 1949 to 22.8% in 1982. The three peasant literacy campaigns have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played a historic role. (Fan Xing-wang)

Anything Could Be Insufficient but Faith: Learning from the Party Leader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Faith: The Party leaders'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expositions on faith have always suggested the simple truth that we could tolerate insufficiency of anything but faith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 state in the new era. Marx and Engels clarifi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ommunist faith in breaking with the old metaphysics and in the practice of workers' struggle. On this basis, Lenin broke down the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t faith.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expounded the truthfulness and peoplehood of the proletarian faith and completed the spiritual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CPC members,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ir main representative, have constantly emphasized enhancing faith through remembering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strengthening faith through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consolidating faith through self-revolution, which plays the strongest note of "tolerating insufficiency of anything but faith". (Guo Hui-chao)

From Self-Criticism to Self-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Centennial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fundamental to the CPC, and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PC's party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self-criticism and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has been sublimated in practice and pioneered in sublimation. It demonstrated the evolutionary logic from self-criticism to self-revolution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for the CPC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way to serving the people. The experience mainly includes: we must adhere to self revolution as an important weap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Marxist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people-centeredness as the valu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s the practical trait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Hu Xu-ming and Guo Cheng)

The "Fragmentation" of Mao Ze-dong Studie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s an important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rxist development, the category of "wholeness" characterizes the basic methodology and thinking structure of the founders of Marxism in studying social history. In view of the deviation of "fragmentation" which has been popular in Mao studies for a period of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affirm an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the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concept of wholeness. Historical studies are based on researching historical details, bu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detail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tory as a whole; historical studies cannot abstractly interpret historical details, but should examine them in the historical whole of universal connection; the studies cannot stop at the level of microscopic researching, but should rise to the level of grasping macroscopic issue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lineage and the historical mainstream, as well as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history. (Wu Xuan)

Indian Communists'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Communism"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in India, a "third being" in addition to Indian secular and Hindu nationalism. In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early communist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PI), the path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was presented as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colonialism to liberal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group of awakened intellectuals turned to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refused to accep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order and development path, and tried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realize the reorganiz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plit the Indian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CPI, which has been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in three Indian states, began to explore in practice a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socialist element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specially from 2008 on, the CPI has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of Indian modernization based on a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It has further reflected on itself in an attempt to resolve real dilemmas and achieve transcending development. (Wang Ji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